

（二〇一九年四月九日出版）

---

本期目录

---

【往事非烟】	“四人帮”猖狂时期我在清华的一段特殊经历	蒋南峰
【广阔天地】	一个赤脚医生的传奇，一个知青偶像的沉浮	孙立哲· 阎阳生
【诚心忏悔】	史国良的一段往事	麦月和弦
【史海钩沉】	北师大的“12月黑风”与“修建科劳改队”（下）	赵惠中

---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  
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

【往事非烟】

“四人帮”猖狂时期我在清华的一段特殊经历  
——写在文革50周年之际

· 蒋南峰 ·

1971年10月林彪事件后，我被解除长达8个月的“隔离审查”。此后，不再提“516罪行”，结论变成“严重政治错误”。听说414一把手沈如槐也是如此。不过当时还剩下一条共产党的好传统，强调政治结论要和本人见面，要经过本人签字。当然，我们不会接受迟群的这种结论。后来，调子又变成了“一般错误”，最后是，清华两派大家一风吹，宣布所有材料已经送到造纸厂“销毁”。但后来“记录在案”的材料又从何而来的呢？

在我被隔离期间，几千里外的老父亲只能用一支又一支的香烟来解愁。1972年10月，我父亲因肺癌去世，给了我极大的打击，是我心中永远抹不去的伤痛。也就使我抛开了对工宣队7·27解救414的感恩心理，彻底站到了迟群们的对立面上。此后，迟群、谢静宜去马振扶中学传达江青指示，更是公开暴露了他们已经取蒯大富的地位而代之。清华仍然是江青等人紧抓的样板，这群人仍然是欲通过清华——六厂二校来控制全国，清华仍然是培养未来接班人的“试验田”，只不过是换掉了蒯大富这匹马而已。只要这帮祸国殃民的家伙存在一天，法西斯在中国借尸还魂的可能性就存在一天。

我开始给中央写信告迟群的“黑状”，揭露他在清华胡作非为的真相。像他在清华开展的批判何东昌的“三个月运动”，我认为不符合十大“团结、胜利”的路线方针，更没有中央文件或主席批示作依据，是迟群的“私货”。后来，陆定一儿子陆德对我说：“怪不得迟群那么恨你，周荣鑫秘书小许说你写信告人家的状，周荣鑫很重视，但不敢处理，就让转政治局。估计主管文教口的张春桥就转给迟群了”

除了告“黑状”之外，此时的我和文革前期不同，身边已没有过去有组织的群众。迟群反复强调要警惕社会上的“反动”势力，倒是提醒了我：必须与社会上的力量联合。于是，

就有意识地发展校内外的社会交往。当然，也学会了运用迟群教给我们的“5 1 6”的单人联系方式。

在校内，当时担任电机系教研组支部书记的文学宓是我江西同乡，我们对迟群、谢静宜的看法十分一致。通过他，也了解到罗征启、饶慰慈等人的动向，但没有直接接触。四人帮最猖狂时期，一次在文学宓家遇见罗征启，他问我能否把材料转给邓小平，我当面表示没有那么大能耐。其实那天我就是去取材料的。事后我要文向罗作解释。当时的人们都严守一个原则：有第三人在场决不多说话，查无对证。谁敢打小报告，想揭发立功，不仅可以不认账，还可以反咬他一口！

这段时期，我高中同学韩琪（国民党东北起义将领韩梅村的孩子）把原无线电系67届学生陆德带来我家。陆德是陆定一和严慰冰的大儿子，文革期间蹲了六年班房，刚分配到中科院高能所工作。以前我和他虽同在无线电系，但他低我一届，而且是高干子弟，所以没什么交往。这次见面，他主动提出交个朋友，我当然乐意。陆定一与邓小平家族关系密切。陆德在哈军工时和邓小平妹妹是同班。邓小平复出后，第一个想解放的就是陆定一，结果这成了四人帮攻击邓的主要罪状之一。

另外，这段时期通过我的老乡还认识了铁路文工团的演员罗明昭，在“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有她的镜头。后来她嫁给了韩琪的哥哥，得知我和韩琪是同学，直叹这个地球村太小。她在养父母家长大。她的养母是冯玉祥的女儿冯理达，养父罗元铮在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经济所，借调到国家计委工作，是于光远的手下。我的老乡告诉我，他们家与朱德、叶剑英家的交往很不一般，经常去两位老帅家做客。大概是出于历史原因吧，冯理达、罗元铮社会交往极广。四人帮倒台后一段时期内，我在他们家先后见到过的客人有叶正大、陶斯亮、胡石英（胡乔木之子），还有张震的一个孩子。

不过，一开始罗明昭告诉我，说迟群代管学部时很欣赏她的养父罗元铮，专门找他谈过一次话，所以我心里很警觉。头一次见到罗元铮，他向我打听清华的运动情况。我警惕地反问他：“听明昭说迟群很欣赏您，找您谈过话。是真的吗？”他说：“胡说八道！小孩子懂啥？是找我谈过，我根本不买他的帐。我能和他们那种人搞到一起吗？”当场暴露了他的政治立场，也解除了我思想上的警惕。

一天，陆德对我说，胡耀邦和周荣鑫在下放农场劳动时，经常在一起议论，被人打了小报告，可能有麻烦。陆表示苦恼的是他不能出面通知他们，我说我可以托人转告。我知道罗明昭和周荣鑫的女儿是同班同学，关系很好。于是我请罗出面转告，当然消息来源是保密的。罗特意去了趟周荣鑫家。不过，周并不以为然。

1975年刘冰等人写信告迟群、谢静宜的御状，引爆了一场针对邓小平的特大政治风波。清华再一次成为风口浪尖。迟群、谢静宜打着最高领袖的旗号引领着全国的运动，使得各种政治势力都把目光聚焦到清华。

这时，陆德来清华找到我。清华两派斗争最激烈的时候，他还在蹲监狱，所以对我的经历并不了解，只听人说清华414是保老干部的。上来首先给我灌输一通：“他们要打到邓小平，如果邓倒了，不仅老干部要遭殃，你我都要遭殃。”我说：“不用你给我讲那些大道理，作什么政治动员，我都明白。有什么我能做的你就讲吧！”他希望我能够及时地帮他了解清华迟群的动向，我表示毫无问题。他告诉了我邓小平夫人卓琳的信箱号码，如果紧要时可直接写信寄材料。但这个信箱号我从来没用过。

我立即找到文学宓，当时他是电机系党委委员。我告诉他，有与邓小平关系密切的人，希望能及时地了解迟群内部的运动部署。他毫不犹豫，表示电机系党委每次传达迟群指示后，会及时通知我取记录稿。

于是一周两次的电机系党委内部的传达布置，文学宓仔细记录在小本上，然后通知我。我用复写纸抄写5份后，即刻趁天黑骑自行车由清华出发，分送西便门罗元铮和玉泉路中科院高能所的陆德等人。在陆德家经常遇见萧克的独生子萧星华，陆德对我说，萧老将军也很关心清华的动向，于是陆德处留下两份。每次从清华出发，经常在路上见到开往钓鱼台的、尾号为10375的迟群的军牌车。我和迟群竟然还是“同路人”。

应该是当年11月中旬，罗元铮对我说：叶帅很关心刘冰的信，能不能搞到原文？我说，清华即将传达主席批示和信件原文，我可以组织几个人尽量详细记录下来。现在我们知道，之前叶帅应该参加了邓小平主持的两次政治局会议，主题就是关于刘冰的信。我不知道叶帅为什么还希望通过清华的人员找信的原文。

回校后我立即通知文学宓尽可能详细记录传达的刘冰信件。另外，还找到当时绵阳分校来京出差的冯振明帮助记录。当时我在绵阳分校办事组上班，周边可以托付的人员不多。文革前期冯是团派，我是老四，当面还有过冲突。到这个时期两派都认识到了江青的真面目。一次他在我面前表露出对江青等人的极度愤慨，所以才敢找他。他后来担任过清华电子系党委书记。他曾对我说，在我后来“二进宫”时，他紧张过一阵，但后来发现没牵连到他，才放下心来。他表示对我很佩服。

我把三个人的记录稿整理后，立即复写分送。不久，罗元铮表示可以十分肯定地告诉我，我们整理的材料已经送到了叶帅的手中。记得八十年代末或九十年代，人民日报发表过冯理达、罗元铮署名的一篇怀念叶帅的文章，谈到1975年那个寒冷的冬夜他们全家去叶帅家做客。他们和叶帅一起警惕地搜寻是否有窃听器，可能就是与递交这份材料有关。否则当时罗元铮怎能肯定地告诉我材料已到叶帅手中？在这个历史的关键时刻，如果没有重要原因，叶帅怎想起请两个晚辈全家去做客？我当时曾提醒过罗，传言有一种红外激光窃听器，如果你不挂窗帘，激光束打在你墙上或窗玻璃上再反射回去，检测激光相位的变化就可能检测到说话时引起的墙壁或窗玻璃的微弱振动，从而窃听你的声音。文章发表时我已经去深圳大学工作，已和他们很少联系，当时也没有兴趣获取更多细节。网上可见这篇文章中叶帅涉及四人帮的话语还被不少人引用，但原文我找不到了。

在清华公开点名批邓前三天，文学宓把相关的布置记录稿给了我。我立即复写转送。第二天一早，陆德给我打电话，说邓家的人要求核实即将公开点名批邓消息是否可靠。因为作何对策将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决不能出漏子。我随即打电话给文学宓，说事关重大，邓家的人要求核实消息的可靠性。文学宓回答：“我以党性担保！”

公开点名批邓之后不久，周总理去世，至1976年4月5日发生天安门事件。此前迟群、谢静宜是集中火力对准邓小平，而此后则开始大规模地清扫邓小平的“社会基础”了。他们以追查谣言为名，开始了又一场整人运动。先是与414骨干人物关系密切的清华附小教师何惠莲，然后是文学宓，被隔离审查，戏称为进“全托”班。罗征启是“日托”，白天接受监督审查，晚上还可以回家。然后是我被强制去铸工车间劳动和接受批判，即也进了“日托”班。打击的目标十分明确，对准的是414原来的一批骨干，还是迫害“罗文李饶”那个路子。陆德也因他父亲的问题在高能所被隔离审查。这一条线上的人全进去了！但我认为迟群只是一种对我个人的政治报复，他根本不可能真正掌握我们的活动。对我的批斗会上，只是反复要我“主动交代传播过哪些有关江青同志的谣言”，我“可怜巴巴”地表示

不知道有哪些谣言，希望专案组能作点“提示”。当然，谁都知道我这是个圈套，谁也不会往里钻。批斗会搞不下去，我知道后面等着我的是什么。趁还没完全失去自由，给罗元铮夫妇等有关的联系人都提前打好了招呼。

当年6月12日，我升级到了“全托”，应该算“二进宫”。这天却正好陆德经华国锋批示予以“特赦”放了出来，因他老婆坐月子。当天他应清华外调人员要求，写下了最后一份材料。承认他向我谈过：陆定一在分得一笔家产后，一半给了牺牲的前妻的家属，另一半交了党费。对此陆德揽下了一切责任。当时四人帮搞了个“中央文件”，定性陆定一是阶级异己份子，理由是他继承了剥削阶级家庭的遗产。我在绵阳办事组底下散布过真相，这是唯一抓到的我散布“谣言”的证据，但我相信谁也不敢来和我当面对质。专案组问我和陆德的关系，我说他来过清华，高干子弟的架子很大，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爱答不理的。我和陆的交往也就没有引起专案组的注意。

十月份四人帮倒台了。罗元铮告诉我，他们曾以为一定不会对清华实行军管，立即给叶帅的女儿叶楚梅打电话，要求把我的名字转告叶帅办公室，军代表进校后一定要在第一时间把我解救出来。但后来进校的是市委联络组。

全民欢庆粉碎四人帮的鞭炮声没有冲昏我们的头脑。早在清华武斗后期，我和沈如槐交换过看法。一致认为：即使414打垮了蒯大富，将来老干部重新上台，照样不会容纳414。用沈如槐的话讲，7·27老四、老团两个组织同归于尽，已经是最好下场。清华政治形势的每一个微妙变化使我们不得不保持警觉。四人帮倒台几年后，我才告诉陆德当年的信息来源，告诉他我还有另一条线往叶帅那边递送材料；才告诉文学宓我当年递送材料的渠道。陆提出要不要大家和邓的妹妹聚一聚？考虑到清华的政治形势，我不希望新的当权者注意到曾经有这么一个从事“地下工作”的小组织，应尽量低调，所以拒绝了。当年文学宓把党内机密泄露给我这样一个非党员，就是在今天也应该属于严重违纪。但我把陆德的好意回来转告了文学宓。

80年代初，开始所谓“清理三种人”。当时已经风闻，直到近年才由“西纠司令”孔丹流传出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1984〕2号文件是对“清理”的最好说明。该文件解放了贺鹏飞、孔丹等一大批“老红卫兵”，把清查矛头重新指向曾被四人帮作为“516分子”清查的造反派红卫兵。甚至被文件重点点名要“特别警惕”的不是聂元梓、蒯大富和他们手下的第二、第三、第四把手，而是414的核心人物陈楚三！此时清华流传出艾知生的一句名言：414比蒯大富更阴险，更有欺骗性。为此我特意找文学宓核对。 he说是校机关一次集体旅游中，艾知生对他开玩笑说的话：“你这个414比蒯大富更具有欺骗性。”我认为此话的背景恐怕并不简单。蒯大富在清华早已没有了市场，清华几乎人人皆知的是：一位原414的骨干人物因抵制不正之风，竟敢公然得罪某大人。

四人帮时期搞黑材料还要和本人见面，还要向群众公布，此时统统“简化”了。重新拿出了四人帮时期整理的、后来以组织名义公开宣布已经销毁的材料，秘密“记录在案”。这种做法不仅违法，而且违纪。据最近流传出来的材料，像陈楚三只因他是“414的核心人物”，以“没有发现什么问题”的现代版“莫须有”罪状“记录在案”。

此时的何东昌已今非昔比，成了与四人帮作斗争的英雄，总揽了清华大权。当年我向中央写信为何东昌鸣不平，何不可能知道。但四人帮倒台后我第一个出来贴大字报，为已经被迟群批倒批臭的何东昌翻案，当时是清华人所共知的。然而就是这个何东昌，在重新上台后，自称1968年5月左右挨过414的打，1984年几次派人找我、调查我，看来非要在414中挖出几个打人凶手不可。我只有表示无可奉告。因为第一我确实不知道，其时

4 1 4 核心正忙于如何对付老团挑起的武斗，根本无暇顾及“死狗”，按分工我也无权介入干部问题；第二，我知道的，也是谁都知道的，1966年的8·24，何东昌等人被贺鹏飞纠集的12个院校的老红卫兵用腰皮带抽打着，像赶牲口一样赶去拆毁二校门，然后关进生物馆毒打，不用我说，你们敢查吗？！从迟群、谢静宜当权后清华干部的总体表现，我认为4 1 4在与老团的斗争中过度美化了清华的干部队伍，而“红教联”对清华干部的评价倒有相当可取之处。

不过，想一想当年何东昌是如何揭批他的老上级、老校长蒋南翔的，我蒋南峰能算个什么东西？在这种大形势下，我只能选择离开。

文革已经50周年，我们这些人均已年过70，自认为已经进入无畏、无私的年龄段了。不用害怕谁再来注意我，也无可能再去找谁邀功领赏。文学宓、罗元铮、冯理达等人早已作古。甚至比我年轻好几岁的冯振明也在一个月前离世，我特意去送了他。趁现在还有见证人，把这段经历写出来，只是想对历史作个交代。应该让后来人去思考：为什么当年清华会有那么一大群人，跌跌撞撞地投身于“文化大革命”，他们的追求是什么？他们经历过什么样的曲折？

文学宓的爱人称，文当时的工作笔记都还在，但她身体不好，不能整理出来。

（动笔于2016·4·14，匆忙完稿于4·18，最后修改于2017·8·6）

〔作者简介：蒋南峰，男，1942年出生于江西，其时父母正在逃难途中。1960年考入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1966年毕业前夕遇上文化大革命，被卷入漩涡。〕

□ 原载：《真话与忏悔——文革50周年清华校友讨论集》，孙怒涛主编，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8年5月

~~~~~

## 【广阔天地】

一个赤脚医生的传奇，一个知青偶像的沉浮

• 孙立哲 • 阎阳生 •

孙立哲（口述）

阎阳生（整理）

（原编者注：孙立哲，原名孙立喆，1951年11月生。1964年考入清华附中；1969年初插队成为赤脚医生。1979年，考入北京第二医学院（现为首都医科大学）读硕士学位；1982年，赴澳洲留学；1983年，考入美国西北大学攻读器官移植免疫博士学位。后在多国攻读多学科的学位。1985年在美国创办万国图文电脑出版集团公司；1993年回国创业。创办多家万国系列公司任董事长，并兼任清华大学等著名大学教授。孙立哲的传奇持续时间之长为当代人少有。自1968年从清华附中到陕北插队，在土窑洞里为农民做了上千例手术，被毛泽东钦点为全国知青先进典型；文革后因坚持赤脚医生政策被隔离批判，被万民折惊动的胡耀邦亲自过问解救。对他的采访历时五年。最近一年，情同手足的“清华附中三友”中陈小悦、史铁生相继去世，给他震撼。我由此随他上长白，下版纳，边走边谈不觉日夜。他年近花甲风云阅尽，对过往传奇率意自嘲极尽调侃，反而更加朴实真切。先摘取一二，或可见传奇老三届之一斑。）

1966年我14岁，在清华附中上初二。文革前我就生长在清华园，父亲孙绍先是清华大学电机系的教授。父母早先是在昆明西南联大结婚的，校长梅贻琦是他们的证婚人。上清华大学，当个工程师，走科学技术的道路，那时候大家都是那么想的。

那年5月，在清华附中爆发了红卫兵运动。我当时的印象，是感到眼前突然一亮，觉得他们是很神奇的一群新人。骆小海的文章《造反精神万岁》，让人看了热血沸腾。王任重带来的毛主席给清华附中的信，大家欢欣雀跃。

但他们非人道的行为，使我的印象产生了变化。比如一些年轻的女红卫兵，让人跪在雨地里拔草，解开武装带打人。我一个邻居叫徐经雄，是高三的高才生。他背后被打烂了都不吭一声，是条硬汉子。

后来因为出身问题嘛，我们就处在一个被动、压抑的状态。我父亲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读过书，他（被迫）承认自己是美国特务。后来他有过两次自杀。这印象很深，使我至今悲剧的色彩非常浓。

红卫兵以后有分化。红卫兵血统论的基础，是对上一辈流血打下的江山的承袭。但是这个基础忽然变了，有的人一夜之间父亲出了问题，原来好的“红五类”忽然变成了“狗崽子”。

后来大串联的时候，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就开油印机刻革命传单。人们知道我们是清华附中来的，把我们也当作起始的红卫兵。我们就以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名义行事，充满了使命感。

串联回来以后，我们就变成了逍遥派。清华园天地自由，子弟也没什么攀比。我们家成了公共场所，大家都来连吃带喝的。我们找大人教授的皮鞋，用铁皮油膏盒熬透明胶，去粘知了、马蜂。有一次我被偶像陈小悦哄去看一个捅破的马蜂窝，被马蜂蜇得头肿了一圈几乎休克，但自此以后五毒不侵。

我那时有两个绝活，一个是下围棋，一个是跳芭蕾。后来插队时我还能同时模仿杨白劳和喜儿跳白毛女全场。围棋在清华园已经没对手了，就找国家队。聂卫平书里写的，两拨各来几百辆自行车，围着地坛公园约棋，就是那会儿的事。

文革红卫兵是我人生第一个震撼，同时是对旧我的自尊心的一种挑战。清华附中竞争向上的理想主义影响了我的一生，后来我一生就都没有停过学习。

第二个震撼是插队，是对你走入社会的基本生存能力和价值的重构。我当赤脚医生也不是我想当，我压根就没有想扎根。人生首先是一个偶然，是史铁生的一句玩笑逼我走上行医路。

1969年1月。就在下乡的那一天，老乡帮我们背行李，木箱子里的书估计有七八十斤重。在我们翻山快到村口的时候，史铁生指着我跟老乡说：这是个大夫。

巧到什么程度，到了村里头，正碰上有一个发烧病号找大夫。一个老太太，发烧，脸上长了一个红色的大包。我们对赤脚医生手册左翻右查，最后得到一个共同的结论：丹毒。我

们知青把阿司匹林，抗菌素，红糖水全都拿出来。两天就退烧下地了。但这红包没下去。问老太太你这东西长了多少天了？“唉呀，生下就有嘛。”生下就有的血管瘤，大红记！

实际上史铁生是懂医的。早前他就在一个医院学习班学会了扎针灸，下乡时带了医书买了药。其他村的女生都不要我，说这个人赖呼呼的。我只好找到史铁生他们那个队，还写了一首诗巴结他，就是怀揣红宝书、豪情啊壮志什么的。被他踩乎的：这也叫诗？说你这辈子不要写诗了！但从此我就和他睡到了一个炕上。

史铁生教我扎针灸、看病。当时老百姓闹得剧烈的传染病，大多是闹伤寒。很多人死在送往医院的担架上。有一次我们俩一起出诊，村里的大白狗一下蹿出来了，我撒丫子就跑啊，他没跑过我，让狗把裤子扯下一大块。

他的面子比较薄，不像我是“不要脸精神”，什么病都敢治。史铁生又加上一句：他是祖传的，就把我撂那儿啦。让我治我就治，拿着书开始比划，治着治着就什么病都治了。

我们上山采药，自己种草药、置办器械、在窑洞里建手术室，成本非常低。成立了医疗站，很多手术器械都是在医院学习时偷的。那时无法无天，为了实习，偷出遗体解剖死尸。手术从简单到复杂：从阑尾到肠胃，到后来心肺、癌症、脑子都做。

有个孩子大面积脱水，奄奄一息。我翻山到那个村，只带了个大针管，就用注射器打点滴一点儿一点儿往里推。从晚上推到第二天白天，30多个小时！手都僵了，把孩子给救活了，孩子叫我干爸，我才18岁。

最邪乎的就是婆姨上吊的事。在打则坪，我已经睡了，忽然外面非常嘈杂，四五个人打着火把跑啊，边跑边叫我的名字。等我到那儿一看，门板上躺着一个女的，直了。婆婆跟媳妇打架上吊，放下（断气）已经半小时了。有几个老汉就拿烟袋锅蹲着抽，人家在那儿商量后事呐！

我刚下乡，哪儿见过死人啊，那也得动手啊。扎人中，一点儿反应都没有。这时我想起书上看来的，最好的穴是涌泉穴。我用这么长的针，反正豁出去了，使劲咔咔往脚底板扎。扎着扎着，突然她喉咙这儿“嗑”一声，这一声就能把人吓着，死人呐！赶紧做人工呼吸。过了大概半个小时，活了。

这可能是假死，但这件事使我走上了不归之路。“神医”就是这么来的，说死人一针扎活了，就是史铁生起哄起的。结果周围村的老乡都来了，医疗站外每天都挤满了人。忙时连上厕所的工夫都没有，外面排队让看病，隔着半人高的围子，一边儿蹲着拉屎一边开方子。还有妇女敞着胸，让给怀里吃奶的孩子看看病。

那一天，七八个小伙子，抬着个人就来了。年轻女的，17岁。我一看神经都吓炸了，一个大铁锹把，从屁眼子进去，从肚子出来啦。她们修水利，把铁锹竖在下面，摸黑收工时一跳，咔就把人穿了，穿糖葫芦。

我没办法，就只有拔。前面三个人，后面三个人，“一二三”拔！硬给拔出来了，我双手一摁，止血消毒缝针。她家里人说“还能生娃不？不能生就别救了。”后来我回乡，一个妇女拦住我，让她的三个孩子叫“大”。她就是当年那个姑娘。

兽医也得做，以后敲猪、杀猪全是我。第一年杀这猪，我们十几个小伙子按住，那杀猪刀咔就进去了，一拔，血呼地就喷出来了。结果一撒手，又跑了。你猜为什么，那刀从肩膀进去了，根本没扎中心脏。

好多知青都想学赤脚医生。脑袋疼，拿听诊器听脑袋；妇女小肚子疼，说可能是前列腺炎；打青霉素试验针，照着屁股咔嚓就一针，说：等着，别动！。逗事多极了，我们小嘛。

丁爱笛他们村张家河大队的一个知青，从北京农学院学会兽医以后，要想提高生产力，公的牛要骗。但他结扎水平不成，把蛋拽出来一较，一下缩回去了，血就哗哗地冒。

我去了以后，做了手术，结扎好，输了两三天血。然后把牛脖子这儿切一口，打一针，输液。牛醒了，但再也干不成活了。丁爱笛在一边急得大骂，全队就指望这头老健牛呐！

老乡送来的白馍、鸡蛋，我说不要，赶紧送回去，就跑了。但我一走，史铁生说话了：撂哈。老乡一走，我们就喊里喀嚓都吃了，“不吃？饿得受不了啦。”那时哪儿吃得上白馍啊。搞批林批孔，老汉说：“这林彪没良心，天天吃白馍还反对毛主席。”

那个时期的青年相当苦闷，我也很可怜他们。男知青之间打群架，血拼，没什么原因，没有以前的派性。女学生的流产都是我做的，有二三十个吧。远近村的都有。

第一批招工的走后，留下的人少了，流产的多了。没什么盼头，失望了。那时也不会避孕。流产没证明不给做，没结婚证更不给做。那成了一个很大的道德问题，只有找我做，我保密。

那时看病的人太多了，人来人往。一个妇女裹着孩子：“娃不行嘞，烧得厉害。”整个一口陕北话。

“娃叫个什么？”

“没名字。”

“你叫个啥？”

“……。”

我赶快改成北京话问：“你是不是我们班某某某啊？”她蓬头土面的根本认不出来。她说：“是了嘛，孙立哲。”

那孩子病啊，那个瘦啊，捏起来皮都回不去。拉着大的抱着小的三个孩子的妈。我根本认不出来，她是我同班同学，清华教授的女儿啊。

那时根本没什么医疗条件。有一个寡妇推磨，晕倒在碾台上了：宫外孕大出血，一听心跳已经很弱，血压就没有了。直接割开肚子，把子宫两头一夹，切开静脉插一个输液瓶。用手扒着，用一个碗往外舀血，弄几层纱布一裹，2000多毫升血，直接过滤。

我们那时候（做绝育手术）到什么程度？就是开一个小口进去，闭着眼睛，全凭感觉，脑子里解剖影像就出来了：腹壁，子宫、输卵管，左右碰一碰，小钩一钩。不用缝针，小口上胶布一贴，就这么痛快。



男的这个太容易了。先开三级干部会，大队长，公社的主任书记全得去，小队长也全得去。在动手术的窑洞边上，排队挨个往下捋，（没结过婚的、48岁以上的除外），一个一个报有多少孩子。

从书记开始，仨女儿，没儿子，好，够格，跟我上那个窑洞吧。一会儿，趑趄着腿晃出来了，“完了，骗完了”。下一个，该公社主任了，6个孩子，有男有女的，上。“啊，孙立哲，我是老汉儿了。”“那不行，正好48岁，沾边了。政策是硬的。”

人家都是普查、宣传、执行分离的，一拨人管一拨事儿。哪有我们这样，既是宣传又是执行、既是领导又是医生，一气呵成；咔嚓！

医疗队排成一排先唱歌。老乡都不知道深浅：这个好，还有唱：“计划生育好，一个也不少，两个刚刚好。”唱完开会，民兵把着现场。一家一家过，20多个，一气都干完了。

根据毛泽东“六·二六”指示，城市老爷卫生部不为人民服务。赤脚医生到大医院掺砂子，我兼西安二院党委副书记，特别左。那时我已担任了延川县副县长、延安地区卫生局长。我就拿出红卫兵的劲头，采取颠覆性政策，大医院大夫每年下农村半年。

这娄子捅大了，拆散家庭，惹了无数人。后来揭发批判我的主要是这些医院，说我上任时宣称：我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在其位必谋其政！开着130改装的救护车下乡，车是吴德送的，全国就两辆，可以在汽车里做手术。

几十年后我回到农村一看，比我在的时候更坏。当年的赤脚医生全到城里大医院，当院长当主任了。农村还是缺医少药，你怎么衡量这个成功？

在农村什么事都有，你什么病都得治。开颅手术不是我主动做的，（病人）他放炮的时候，把一个骨头整个炸进去了。如果不撬出来，一打鼾，离死就不远了。去城里来不及，在我这儿就直接打开大脑办了。

最火的时候，好几台手术同时开始，流水作业。五、六个农民一字排开，肚子都豁开，然后我戴上手套依次咔咔几下，“缝！”

这时抱出一个孩子：“赶紧，没气了！”喉痉挛，人憋成紫蛋了。我捞出一个扎腰的手术针，咔嚓一下扎进气管里啦。气管太细，全是痰。赶紧把一个导尿管插进去，叫助手肺炎：赶紧吸！

大概是1974年，中央科教组派专家团到乡下考察我。北京第二医学院的副院长教授李光壁（音），带着各科的十几个专家医生教授来了。

他们到我窑洞一看，全是外语书，西安影印的英语医学杂志。写的病历大部分是英文的。我的女朋友懂英文，我一天背150个单词，通信全用英文。

李光壁啪地抽出一本：你还学德文呐？念念。他是留德的，浓眉大眼，很凶的样子。我念了一段，他没听懂一个字。我是按英语发音念德文的，没有人教我。他问，上面说的什么？我翻译了一遍，全对。

但看手术是最严格的，他们都是国内顶尖的临床医生啊。他们不相信在这么简陋的窑洞里能做这么大的手术，中国医学科学院黄家驷老院长就站在旁边。我大概是全国知青典型中唯一接受专业考察的。

他们这些主任们就很震惊，回来给科教组写了个报告，转发全国。黄老把我列为吴阶平主编的《外科学》的正式编委。成为周恩来主抓的中央针刺麻醉领导小组成员。

回来就出名了，一大帮中央北京医学院大夫来，一大帮本地赤脚医生来实习。我们自己种地，制药、盖房子。村里住满了来看病的老乡，一大片人，非要我摸一下不可。

报纸、小说、电影，还被编入小学和中学的语文课本。北京电视台拍片，新影专题片：赤脚医生孙立哲。电影不是《春苗》，叫《红雨》。

原来我的名字是“喆”。人民日报登曹古溪写的文章时，没有“喆”这个铅字。人家有文化，说古代“喆”“哲”是通用的

1976年唐山大地震，头一辆进入唐山的卫生列车，我是几百名医护人员的医疗总负责。半夜进到丰润，到处是伤员，臭极了。我们唱歌、抢救、手术，一列车伤员，拉到萧县。

最早是1971年，县里派人找到我：你是孙立哲吗？让你参加一个回北京的汇报团。就像是天上掉馅饼一样，居然第二天让我去延安。

内容先试讲一次，行医怎么学毛选？把我难住了，毛选没学，哪儿有工夫啊。北京写作组几个笔杆子熬了好几夜，听各种消息，给我编了一个稿。

我一看，没法讲。讲第一次做手术，把贫下中农肚子打开以后，耳边响起毛主席的教导：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顿时心中充满了力量，快速找到了破裂的胃，把穿孔迅速缝合。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响彻云霄。

这哪儿跟哪儿啊，纯说瞎话。这肚子打开了，我啊怎么想？满肚子血呼呼地直冒，找不着伤口啊，心里直冒凉气。

然后心里发生巨大障碍。我从小有一个大问题，我大结巴，能说话，但是让我演讲，没有实话就没法讲。

那天晚上在延安地区招待所，也就七八十人，听我试讲。我就讲了三句话，喝了三暖壶水。以后结巴到一个字也讲不出来。一个是紧张，一是纯假话。

主持会的也愣了：这要当先进不就出娄子了嘛，不会说人话？！这是送回去还是接着讲啊。北京说，学习毛选树立的典型我们最生动的就是他了。找我谈话，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对着大树，赶紧练，念稿。

这时出娄子了。一个老头追到延安来，哮喘发作。我大树底下，稿也得念，病也得看。拿长针扎，一紧张，把肺给扎漏了。我浑身发软，什么设备都没有，赶紧找我的大针管，一针扎到肺里，用负压吸。

我就一边念着这稿子，一边抽，这老先生真行，出不来气，坚持着。抽了一天多，稿子给生背下来了。为什么呢？没有活路了，我要被遣返农村，我心里扭曲啊。但意外的收获是，结巴治好了。

到北京讲座，开始是背稿。后来就脱稿。讲真事就生动了，我从一个字不会说的大结巴到口若悬河。到什么程度呢？一天三场，一个月100多场报告。敲锣打鼓，夹道欢迎。

最大的一次是1974年3月5日，全市纪念雷锋多少周年。工人体育场是主会场，全北京28个分会场，几十万人听。吴德主持，谢静宜开幕讲话。两个发言的，我是代表农民的，工人代表是马小六。

谢静宜说讲得好，高校讲了一遍，各医学院医院敲锣打鼓抢。在清华附中也讲，常振明就在下面听着。这触发了第二次下乡高潮，很多学生坚决要求去延安，一部分就是叫我忽悠的。

这个（影响）还扩大到国外。我作为中国青年代表团的成员访问了欧洲和非洲，那时出国是很罕见的。1973年访问法国，穿着中山装在香港丽舍大街上像个怪物。我对西方的发达感到震惊，隐约觉得中国要出大事。

1974年，省委书记约谈我：中央出文件了，点了5个人的名，邢燕子、侯隽、朱克家、孙立哲、程有志，树为扎根农村典型。1974年知青会议，毛泽东圈阅文件。在几千万知识青年群体里，五人被树为全国的榜样。又通知填表，我和团省委书记韩志刚两个人一起为候选团中央委员。

开大会和作报告成了我的新“专业”。在报告团里我和其他几个报告人就熟了。侯隽和邢燕子就说：小孙啊，赶紧找一个农村的，赶紧结婚，才能表示你扎根农村。侯隽还专门到延安劝我：“丁爱笛找了农村的结婚啦，好。这才叫扎根，光口号不行。”

我当时有个女朋友，但没敢暴露，是在美国喝洋奶长大的。她在舞台上主演李铁梅，没有卸妆，就来找我。你想，那个年代，光秃秃的黄土山、黑乎乎的土窑洞，突然出来个这么光彩照人的女孩儿，直接就是“我爱你”，那不是闹着玩儿的。

跟她分手，纯属政治上的压力，她父亲是原国民党驻美国的总领事，起义回到中国来了，又打成右派。让我扎根农村，是省里的光荣，怎么能让你找这么个危险家庭的？

我别提多后悔了。我那时虽然已做过上百例结扎，但没经过感情萌动。我也没有找农村的。我心里最想的还是上大学。下农村，我带的箱子里全是书，几乎都看烂了。那两年推荐和考大学，我到县里考得相当好。虽然没公布成绩，那绝对。

北京医学院和北京外语学院都录取我了。因为我的英文也挺好。那时我已经是延川副县长了，当赤脚医生后，又订阅了西安影印的英文医学杂志，加上和女朋友秘密写信，写的主要是英文。北外招生，主要是面试：没想到这么好，要了，高兴坏了。

在北京巡回讲演时，迟群和谢静宜几次把我叫到工字厅谈到深夜，谈教育革命怎么搞。那时张铁生交白卷已出来了，我还是想上大学。她说：“你的案例对教育革命是一个很大支持。旧教育制度下，人越学越蠢，越学越死。你是实践出真知，不用上学，比他们上学的强得多。”指我没上过学，但医学院毕业的专科大夫们都跟着我手下干。

谢静宜还是挺女性的，狂也是女人那种狂，和江青挺像，说话特厉害，出口的话就是命令。在北京工体大会，几十个分会场几十万听众，她是报告会主持人，是代表北京市委、团中央的。说我的例子和张铁生的例子，就不用上大学。我心里凉了，想上学也没法说了。

她让我给清华和北大两校作报告，还建议我和张铁生一起去全国巡讲。我借口村里几百号病人等着我，先回村去了。幸亏没去，去了就萎子了，张铁生后来判刑十几年呀。

1975年延安知青代表会议。我执笔给毛主席写信反映陕北医疗太落后，有彭延、马向东等六个赤脚医生签名。怎么交？我说我有办法，由谢静宜转交江青。

后来一个大的转折使我完全灰色了。毛泽东去世，在大医院悼念。我和一个管广播女孩聊了一夜，被书记听了墙根。第二天紧急会议，让我说清楚。为什么关灯？怕影响别人。谈什么？谈人生理想，革命、人生、个人转折。有无恋爱？死不承认。

实际不是一般好感，她是大家闺秀，非常漂亮，照片上了大型照相馆橱窗。在毛主席逝世期间敢谈恋爱，你研究过吗？什么性质的问题？这涉及到她的人生名誉、我的政治前途。

接着“四人帮”倒台，人们欢呼，我受审查，中央领导人批示，说我是卫生战线上的“四人帮”爪牙。村里知青全去高考或招工，就剩我一个啦。我性质变了，政治上垮了。我想，这回踏实了，扎根吧，别聊别的啦。

太难受了，在村里房东家喝闷酒，两瓶半西凤酒、一瓶半葡萄酒，一口气干完，后来都没味儿了。不省人事几天醒来，皮肤和眼睛金黄，村里赤脚医生娃子说你咋变成了金丝猴。送到延安医院一查，黄疸指数二百多，诊断亚急性肝坏死，死亡率97%以上。大量打激素，把糖尿病也打出来了，眼睛肿成了一条缝，站也站不起来，人都毁了，成了猪一样。

出院以后，回清华家里，拄着个小棍儿，慢慢腾腾地迈着方步，脸肿着。听到的都是发小们上大学的消息，邻居小悦、小苗兄弟俩一起考上了清华，华苏（华罗庚之女）、籍传恕也上了清华，庞芸上了钢院，周围的人都上大学了。我连考试都不能考。

有一天正在清华家里，寄来了一个箱子，毛主席逝世时结交的那位女友把我给她的书和信都寄回来了，倒霉的事扎着堆来，心情跌到人生的低谷。想钓鱼散散心，很长时间才能走到荷花池。我挖蚯蚓连铁锹都拿不动，让爸爸帮我挖。我都二十好几了，看着一帮七八岁到十来岁的孩子，粘蜻蜓，粘知了，他们有身体，有未来，个个比我强。命运不知要把我带到哪里？

有一天我的外甥来了。他第一次钓鱼，就钓出来一条半斤多的鲤鱼，平常我只能钓上很小很小的鲫鱼。兴高采烈提了条大鱼回家，看到解放军站在门口。军代表宣布：孙立哲在“四人帮”问题犯有严重错误，立即回延安接受审查交待问题。那时已成立了省地县三级联合调查组，卫生部长上任，要抓“四人帮”在卫生部代理人，批示说我是“震派人物”。

只有几天期限要写出交待认罪材料，和“四人帮”有什么关系？见过什么人？一点儿一点儿挖。给毛主席的信，是通过谢静宜转江青，给江青的信是“效忠信”，抓捕江青时发现的。

“四人帮”没有接见过我，但迟群和谢静宜老跟我聊，让我作报告啊。我脑子一片混乱，有苦说不出。好在中学同学史铁生笔头子好，帮我写检查交待材料，文字游戏具体肯定抽象否定：犯了不可饶恕的政治错误，但是心是忠于革命的。

吴北玲上北大中文系77级了，每天下课就来铁生家帮我写认罪书。临行前她叮嘱我：最大的罪是思想罪，任何时候都不能承认主观上是反革命的，一承认就不好翻案了。

押回延安，住进地委大院一个黑洞洞的窑洞里，每天上午扫院子劳改，下午接受专案组询问审查。记着史铁生教的：有病、少说话。那就多抽烟呗，我以前从来不抽烟，交代问题烟不停地抽，还是双枪，两根并在一起抽。

一盒劣质的烟几个钟头就完事儿，咳嗽、吐痰、手捂着脑门。按铁生教的招儿：就说有病脑子坏了，什么也想不起来啦！耗时间呗，让我好好想想。

大礼堂开批判会，横幅大标语，孙立哲几个字倒着写打上叉。两个民兵押送，一进门口号声响起：“肃清孙立哲在卫生战线上的流毒！”没有老乡，全是卫生局、防疫站的干部和医务工作者。

我低头拿小本记录，像个黑帮一样。卫生局一个姓温的干事：“孙立哲，想不到你也有今天！你当了卫生局副局长上任第一天——我记得清清楚楚——就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我是说，既在其位，必谋其政。我当时兼任卫生革命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管全地区十多个县以上综合医院，上百个地段医院和公社卫生院。坐着专区唯一的一辆老式救护车，跟真事似的，到医院视察发指示：大医院医生为贫下中农服务，全部轮流下农村！

那些知识青年出身的医生护士们，都没发言，只低头跟着喊口号，躲着我的目光。

调查组在农村那边开揭发会，谁都不主动发言。知道孙立哲吗？知道。孙立哲犯什么罪？不知道。他们就挨个挖材料，找动过手术的人，一个个查医疗事故。发现了我治过的一些老乡拄着拐，一条膝关节不能打弯，这下可找到医疗事故了。

这种大骨头地方病，刘拐子病。最严重的两条腿弯曲着挤在一起，根本站不起来，没有生活能力了，专业医书上说是晚期终生残疾，没法治。我发明了一个手术，就是把一条腿膝关节上下大骨头都截断再上下对齐，用一条条不锈钢板和钉子给铆起来，打上石膏让它长直了。一条腿是直的，是支撑的，另一条腿是弯的，这样架个拐居然能走路了！

在当地推广，我在川里治了五六十个这样的病例。医疗事故调查组见到齐家坪一个病人经我手术后上炕一条腿不会弯，要定为我的医疗事故。老百姓不服这个理，难道医书上没有的就是医疗事故？以前只能在炕上滚地下爬，手术后能走路了，基本劳动能力恢复了。看孩子做饭都没问题了呀。

老百姓恼了，听说我到了延安挨批判，翻山越岭几百里来看我，走路的赶车的骑自行车的都有。到地委问小孩儿，找孙立哲，孩子答：“是不是扫毛子的那个老脑（大脑袋）？”那时我身体非常坏，在地委大院低着头扫厕所，脑袋肿得老大，像个怪物。

乡亲们偷偷进了我的黑窑洞，拿出鸡蛋拿出馍，还有棉线织的袜子、土布鞋。他们告诉我，省地县来了大干部，多少人下来调查可凶哩，开社员大会，说是中央的政治任务必须完成。来传话的男女老少，老太太什么人都有，房东干妈康儿妈来了好几趟。我让他们赶快走，可不敢再来了，不能多拉话，我正在挨批判。老乡说咱受苦人怕个甚么，顶不济也坐班房，吃饭不要钱！回去传开了，被治过病救过命的老乡心里过不去，要想法子救孙立哲。

那时不是批判会就是写检查。压力一大，身体反而慢慢好些了。不绝望，爱咋地咋地。开批判会我就低头记录，下来赶紧整理，当天晚上找画家靳之林还有邵明路、臧若华等几个知青朋友，往北京给吴北玲、史铁生发信传话。

在村里有个知青杨志群，是1975年在北京听了我的报告自愿来延安的，他说干脆写个反映吧。内容是：孙立哲肯定有缺点有错误，需要批评帮助。但是这个人是个好人，做过很多好事，治病救人，从不收礼。希望领导也能了解。

社员开会抵触省地县联合调查组：我们不晓得政治错误是个甚么球事，就知道孙立哲看病救人不要钱，不收礼，是个好心人。因为以前医生下乡都端着架子，先吃饭，再看病，还收礼。

我那时虽然兼着省地县各种官位，实际上是个不脱产的农民，只拿工分，没有工资。

那边开社员大会批判，这边开小会签名。从那边大会出来，就有人引到这边签名。老百姓间秘密传成了一句话：啊呀，签名就能救孙立哲！这边各村传：咱们多一个签名，娃娃多一份生望。

我给谁治过病记不住，老乡没有忘。陕北穷人多但是有良心：明天起身出门要饭，今天门上来了叫花子，最后一口黑糠干粮也掰下一块。结果本村的外村的，近的远的来了不少。签名的、按手印的，什么样的纸都有，花里胡哨的连在一起往上贴，弄成了很长的一个“万民折”。

北京那边儿，铁生家是“捞”人联络站，他帮我起草申诉书，还找熟悉的朋友，出谋划策的人有电影学院青年导演班的柳青、张暖昕，抱不平的有陈建功、李陀、赵振开、刘心武等。王立德专门传递最新情况。

史铁生和北玲一块儿天天商量怎么给领导递材料。北玲在北大逃课跑外线，通过师大女附中同学关系，找王任重、顾秀莲。同村的知青刘亚岸帮忙找人。最后递给了胡耀邦。他们说胡耀邦还真是知道我。胡耀邦、胡启立都了解我，明确表示说：这个孙立哲抓错了，他怎么会是“四人帮”呢？胡耀邦在开会时就找到王震说：小孙不是“四人帮”，另外，这个人现在有病，王震同志对陕西干部熟，请王震同志关注一下此事。

王震就不那么斟酌了，抄起机要电话当场找省委书记接电话，开口就是给我查查在延安有孙立哲没有，他身体有病赶紧给我送回来！

突然那天，地委书记带着副书记、卫生局长一大帮人，黑压压涌进我那个黑窑洞里来。我已经习惯了，不又是批判嘛，我头低着。地委书记一把抓住我的双手使劲摇啊摇：啊呀，孙立哲同志，你受苦啦，俄、俄们不了解情况啊……卫生局长拿出好烟：吃烟吃烟。好几个人忙不迭同时擦火柴。

当天晚上，就住进地委最好的招待所，第二天，飞机直送北京。救护车在机场等着，直接拉到医院住进单间，就这么厉害。一夜之间，天上地下，你研究了吗？这就是政治。中央直接打电话，这就很严重，就是个政治态度问题。

当时救出来的理由是有病，那话就听出来了。第一次住在地坛第一传染病医院，黄疸加上治疗不当高钾型酸中毒，在床上干挺着，一动不动。响应能力不在了，以前所架构的那些东西，包括对未来的预期、对自己的看法、随着被打倒，全部破碎了。加上身体本钱的丢失，这你就变成了一个无能为力的弱者。

那时我趴在病床上，期望值低到什么程度？看到护士的脚在床前走来走去，羡慕人家走路这么有劲，会走路，真好。实习生夹着本书来查房，我觉得：能看书，真好。窗外一只小鸟叼着一根小草，那广博的天地，那自由，但不属于你。

出院不愿回清华家里，又回到了铁生家。1977年78年接着高考，发小们都上了学。我整天拄着个拐棍晃悠，我有脸见你们吗？太难受了！

为什么住在铁生家里？一是在农村睡在一条炕上。二是，我两次送他到北京看病。三是我出事了他家就是救我的联络站。原来你在潮流的浪尖上或者在潮流的中央，极大的个人膨胀。现在整个被边缘化成了三无四有人员：没学历、没收入、没户口，有病、有前科……

我无处可去，首先想到的是他，他已经完全截瘫了，比我强不了多少。我政治上完蛋了，没想还能爬起来。他自己走投无路生活困顿，却全力帮我置之死地而后生。他是我的救星。

雍和宫旁边一个小院子里，两小间房子很挤。我和铁生住大点儿的一间，他爸爸和他妹妹（史岚）睡小屋。他爸从此没脱过衣裳睡觉。晚上往那儿一靠，早晨5点多，准点起来买豆浆买油条。他长期高血压，手抖，请了长假照顾瘫儿子。

开始时我们晚上一宿一宿地聊，诅咒自己的命运和这个社会的怪现象。我们两个身体困境使未来希望变得很微弱甚至消失，感到命运的无可奈何。

我妈天天往铁生家跑，絮絮叨叨地劝我和铁生要想得开。我父亲也常来但不说话。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怀疑是派遣的美国特务，他用遍了数理化三栖逻辑推导不出自己的清白，几次自杀又阴差阳错被救了回来，多年在惊恐中生活不敢多说一句话。这期间铁生以我父母为原型写了《法学教授及其夫人》，1978年陈建功帮他联系发表在杂志上。

铁生后来写了《病隙碎笔》，送给我那本的扉页上他大大的字写着：立哲，第五章献给你。我一看，这章专门探讨生命的意义，好多话针对我当年的困惑。

我的心情逐渐开朗。我说我吃激素脑子完了，可腿还能使；你是腿残了，脑子还能使，咱俩弄不好还能拼出个完整人儿干点事儿。铁生笑了说，这拼出来的人到底是你还是我呀？我说当然是你呀，脑袋指挥腿嘛。铁生一声断喝：别价别价你千万别往下说了，我这脑子要是还能指挥腿走路，我还不立马就得疯喽！

夜里一对病残人对着天花板品着各自命运互相开导。白天他摇车去街道工厂画彩蛋，我一个人往北新桥菜市场那儿晃，回来做饭：今儿吃什么？史岚放学一回来，摘菜去！说什么干什么。史铁生大指挥，我二指挥。他全力在帮我，也帮成了。

转机来了。1978年底，医学院开始招研究生，而且年龄没有26岁的限制。我想，好了。但我上哪儿报名去啊？没单位、没户口，黑人啊。我就想起了北京第二医学院的副院长李光弼。

他当年带专家到我们村考察我时，在我的窑洞一个炕上住了不短的时间。李光弼爱下棋，我是围棋业余高手，一下棋，关系就不一样了。这次他带了一盒虾来看我，要跟我“手谈”，在庞沅家里，他和庞沅的母亲是北医的老同学。

我试着问想考考你们的研究生，可是没户口没法报名。他说，我给你证明。说办就办，第二天就亲自带我到科研处，说这个人我认识不用介绍信，给他报名，让他考。这都是救命之恩。

还有一个多月考试，考5门功课。外语、政治、外科、病理、解剖。我一看，这可和以前看病动手术不一样。尤其是病理，从来没学过。组织学没看过显微镜，病理解剖都没学过。

背水一战的时候到了。

我找了个小黑屋，往架子床里一窝，啃干粮喝开水，硬是没出门。病理解剖是死学问，硬看、生背，厚厚一本书整个背下来就行。其他如外科我有点基础。外语没有问题。政治没有时间，我自认为比较强。

可我从来没上过大学考过试，我的临床学科对手都是“文革”前大学毕业有行医资格的医生，心里没底。考完回家我妈问：可回来了，考得怎么样？我说考得大概不行，想写的内容太多写不完。

我报的导师是北京第二医学院院长兼同仁医院院长戴士铭，还有外科主任龚家镇。过了三个礼拜，戴士铭院长的儿子找到我：你行啊，我爸说你考得好呀！过几天李光弼院长也打来电话，说我考试名列前茅。

后来才知道，我的总分和三门主课都是全国考生中的第一名，病理96分几乎满分，政治最差，刚刚及格。命运终于转折了，我的生活奇妙般地重新有了颜色，我和北玲在热烈的恋爱中又共同憧憬未来。

这期间，兼任清华领导的胡启立曾约见我，转达了胡耀邦的关心。同样是在工字厅，这命运呀，真是难以捉摸。

上研究生是我再一个突然的转折。我由完全不懂政治，从赤脚医生开始接触政治，表现出对政治的无知，到忘乎所以极度膨胀，到最后被打倒。后来就为此远离政治。学医给你一个很鲜明的价值感，一直延续到现在。

□ 原载《北京青年报》2011年10月21日，2012年3月9日

~~~~~

【诚心忏悔】

史国良的一段往事



史国良毕业于中央美院研究生班，曾为解放军艺术学院教师，曾出国，在加拿大遇到星云大师后出家，后又回国，以“画僧”入世，任中央美院、首都师范学院等高校客座教授，同时在中国国家画院、中国艺术研究院任研究员。

正巧手头有史国良写的两本书，《回望红尘》和《悲欣交集》。书中有他“出世”、“入世”的许多往事，其中有他“文革”中和女老师的一段故事读了让人动容：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人们都疯了……那时，上边今天打倒‘刘、邓、陶’，明天打倒‘杨、余、付’；说这个是变色龙，说那个是小爬虫。班主任申老师在课堂上讲解瞬息万变的政治形势，一个个点说那些被揪出来的政治人物的名字时，失口说林彪也是变色龙。这完全是口误，她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还在继续往下讲呢，可我们这些孩子却听得清清楚楚。她敢说林副主席是变色龙，她是反革命！我坐不住了，跟同桌的王启亮同学嘀咕一番，结果没等到下课，我俩就非要去厕所，其实是跑到革委会报告去了。

革委会的彭主任，听我们讲后很兴奋，说申老师是地主出身，家里还挂着‘五世同堂’的匾，念念不忘她那个地主家庭，现在竟敢说林副主席是变色龙，无疑是典型的反革命！然后警察来了，让我们写材料，写好后，按手印。一按手印，我心里就害怕了，那时看过电影《白毛女》，杨白劳卖喜儿被迫按手印，现在让我们按手印，肯定是特别严重的一件事情，于是浑身哆嗦。那边就安慰我：‘不要紧，你们革命小将警惕性最高，毛主席早就说，你们是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要勇于和阶级敌人作斗争。’

申老师叫申世恩，平日对我特别好。她做家访，总是夸学生，从未在家长面前告状。她常夸我会画画，对我父母说，这孩子特别有才气，将来说不定就是一个画家，叮嘱我父母在这方面多培养我。我爸我妈十分重视我画画，与申老师的提醒与鼓励分不开。我上课画画不听讲，申老师当然不高兴啦，但她激励我说：‘你要多考一分，我就让你画画。’她办公室的玻璃板底下压着我的画，每次她找我，即使是批评我，但我一看到玻璃板底下的画，就特别高兴，特有成就感。就是这样一位好老师，我竟毫不犹豫地出卖了她，可见那时的政治氛围对一个孩子的心灵有多大的伤害。

抓申老师的前一天晚上，她还来我家家访。她的脸色很沉重，轻轻地问我：‘你真的听到我说林副主席是变色龙了吗？’我点了点头。她长叹了一口气说：‘唉，我怎么一点儿都不记得呢？’她临走时对妈说，不怪史国良，他是孩子，不懂事。老师走后，我妈追问我是怎么回事，我从头至尾讲了一遍。她一听就火了，拿起笤帚疙瘩没头没脸地抽打我。边打边责骂：‘这么点儿小孩怎么变得这么坏，这是缺德的事，害人的事……’她每一下抽打，都在唤起我潜在的人性。

申老师被关进了牛棚，让她干重活，拉砖坯。看着她被批判、挨打，我特别难受。批斗时，让她站在三个椅子摞成的高处，挂着一个大牌子，撅着。脚底下摇晃，脸上的汗珠子往下滚。她名字叫申世恩，造反派说她的这个名字也很反动，她是吃剥削饭长大的，还要世世代代不忘地主家庭的恩情，这就是想翻天。拿皮绳鞭抽她，一鞭子下去，她身上马上起了一大串红络子。

因为申老师老不交代‘问题’，就说她很顽固，把她关到厕所里了。学校西南角有个厕所，在低洼处，一下雨，里面全是漂着屎尿蛆。在那里放了两张废弃的课桌，让她在里面写

材料，光着脚，腿都泡发了，泡白了。我拿了几个西红柿给申老师送去，她说：‘这是我今年吃到的第一个西红柿，你知道吗，我最爱吃西红柿了。’我说：‘对不起，我不知道会是这样。’她说：‘你是孩子，不懂事，不怪你。’后来，只要有人打申老师，我就护着。打人的学生，都是我们那一带的孩子，都认识。我叫上我姐我哥，在那儿护着申老师，不允许他们打。邻居家有个孩子，打人比较狠，拿关门闸的弹簧打老师。弹簧一使劲甩开了，拉老长，落到人身上，一下了停住了，弹簧就缩回来，把肉都夹在里面，然后再一揪，一溜皮肉就拽了下来。他拿这个打申老师，我们就跟他打架，我家孩子多，堵在他家门口打他。

申老师是因为我的检举而被抓，被打成反革命的，多少年之后，这成了我心里的一个结，年纪越大越觉得亏心……‘文革’后，申老师调走了，调到何处，不知道。后来，只要遇到学校的同学和老师，我就打听申老师的下落，找她找了三十年，道歉的话始终含在嘴里，没有吐出来。2000年的时候，《北京青年报》征文，题目叫‘真想给你拜个年’，我写了《申老师您在哪》，讲出了这个小故事。这是压在我心头三十多年的一块大石头，想起那段经历，我就喘不过气来。文章登出的第二天，报社来电话，说：‘史国良，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申老师找到了。’我半天没回过神来，媒体太厉害了。接通申老师电话后，我哭了，我想把压了三十多年的道歉话，一口气吐出来。老师说：‘你还记得这事呀？你小嘛，我说了，不怪你，都过去了。’我说，我一定要见您。于是当天我就到了她家。老师还是那样，圆脸，两个酒窝，只是头发全白了。我俩抱着痛哭，她拍着我的肩膀，连声说：‘别哭了，别哭了，这事都过去了，老师不怪你……’

中央电视台的崔永元看了报道后，来找我，要做一期《实话实说》，申老师也同意上节目。录制时，讲到动情处，我哭了起来。原来没想到讲故事会控制不住，没有带纸巾，没有带手绢，崔永元就把他的手绢给了我。但讲着讲着，他也哭了起来，也没有什么东西擦泪水了。随后，观众席上，也有很多人哭了。于是，暂停录制，送来一大摞餐巾纸分给大家……

这期节目播出后，国内外又有多家报纸和电视台做了采访。我想，无论是年老的人还是年轻的人，在内心深处都有相近的良知和道德情感，当然，对于人性的复归，也有相同的期待。”

“文革”给一代人留下了刻骨铭心的伤痛，给党和国家造成了极大的损失，想到这段历史就会让过来人不寒而栗。“文革”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耻辱，其余毒的消解可能需要很久，远远不是“过了就过去了”那么简单。

2015-4-10

~~~~~

## 【史海钩沉】

### 北师大“12月黑风”与“修建科劳改队”（下）

• 赵惠中 •

（上接zk1904a）

#### 四、修建科劳改队

1967年5月29日上午，刘中柱、杨以鸿、李文博、敦进田、张传亭和李世取从半步桥看守所回校。回校后立即被各自班上专政小组的人带回本系或本班接受批斗，李文博还挨揍了，李世取被“坐喷气式”。

几天后，杨以鸿、李文博、敦进田、张传亭和李世取再加一个陈宝殿被送到修建科劳动，刘中柱被送到事务科苗圃劳动。修建科劳改队形成了。先后入修建科劳改队的共有16个学生，两位干部共18人。管理劳改队的开始是较年轻的傅师傅和王师傅，不久换为年老的冯师傅，冯师傅一直管理到“劳改队”解散。

这16个学生与两位干部分别是：

第一批都是学生，共7人：

1.陈宝殿：河北人，谭厚兰班党支部书记。由于和谭厚兰们的矛盾，被送到修建科劳动。调干生，入大学前当过小学校长。他认为他是真正的革命派，认为这些人才是真正的反革命。因此觉得和他们劳动，太冤了，丢了他的面子。整天闷闷不乐，并不断将修建科里这些人的反革命活动向上面不知道什么人汇报。但修建科的冯师傅等一直护着这些小反革命们，使他们得不到他认为应得到的惩罚，因此更加闷闷不乐。1967年底，到沙城农场，然后分配，以后一直不知其消息。

2.杨以鸿：物理系三（3）班学生，江西南昌人。

3.刘中柱：物理系三（3）班学生。湖南长沙人。

4.敦进田，中文系一（2）班学生，河北人，大字报署名“林峰”。

5.张传亭：中文系一（2）班学生，安徽阜阳人，大字报署名“向东彪”。从署名看，这二位表示他们至少是尊敬毛泽东和林彪的。

6.李文博，物理系三（4）班学生，黑龙江佳木斯人。

7.李世取，数学系二（1）班学生，四川重庆人，典型的四川娃儿。不苟言笑。除非他自己想笑，他人休想逗得他笑。

以后陆续送到修建科劳动的有两位干部和九名学生。

两位干部是：

1.于陆琳：教育系党总支书记，国防科委副主任钟赤兵的夫人。北京地下党员，被认为是彭真、刘仁黑帮集团成员。也不知怎么就被送到修建科劳动了。修建科给这些反革命腾出一两开间的房子休息。于陆琳的主要工作是打扫这间房子。由于经历过多次党内运动，她对这些小反革命的前途并不持太悲观的态度，视他们为一群小顽童，和他们有说有笑，并不时泄露出一点点她们上层妇女间的一些流言蜚语，引得大家瞠目结舌。不多久，她被叫回系里。

2.浦安修：彭德怀元帅夫人，曾任北师大党委副书记，“文革”前是北师大附校办公室主任。

于陆琳和浦安修两位前辈年龄也不算小了（于陆琳小一些），又是女的，只能安排在修建科内给一两个师傅打下手。当时于陆琳的丈夫钟赤兵将军还没有被打倒，所以于的日子相对好过一些，浦安修因为彭德怀元帅的问题，她的心理压力较于陆琳大许多。其境遇更令人唏嘘

一次，她们两人都挨了斗，原因是修建科一位与她们一起劳动的工人师傅家里生活困难，接受了她们的些许粮票和很少量钱物资助，被人揭发，说她们用“糖衣炮弹”拉拢、腐蚀工人阶级，逃避改造。

后来，师大开大会斗争彭德怀，将浦安修拉去陪斗，使其身心受到极大伤害和摧残。

九位学生分别是：

1.王文×、2.孟繁树：中文系五年级学生，贴出反对“中央文革”的大字报。五年级的学生见多识广，不知道采用了什么办法，一直没有被送到修建科来。他们只是在后来才被送到修建科来，但呆了不长的时间，就到沙城农场。孟繁树后来毕业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博士研究生。任中国艺术研究院文艺研究编辑部副编审、编审，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研究员。王文×不知去向。

3.方义奎：外语系俄四学生，湖北新洲人。在平常的言语中偶然出现对毛主席不敬，兼与井冈山公社成员矛盾公开化，被送到修建科劳动。虽然专业为俄语，但具有深厚的中文功底。唐诗联句“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韦应物《滁州西涧》），刘中柱就是从他那里听到并记得的。需要具有高格调的人，才能从《唐诗三百首》中，找到这首诗，并体会到这首诗的美。他虽然不是伟丈夫，但却是一位情圣，一直记得某人。他脾气平和，但毕竟是九头鸟一个，在极端情况中会露出男儿本色，特别是遇到川娃子的时候。某次，他与李世取一言不合，便要动手。好在当时有其他人在旁（没有其他人时是否会发生这一幕，则不知），被劝开。但以后他们却成了最好的朋友。后来，他到沙城农场，然后分配到湖北大冶程潮高中，“文革”后也考取了研究生。

4.杜哲森：中文系一（3）班学生，天津市北郊（现北辰区）人。因对“文革”持抵触情绪，写有大量所谓的“反动诗篇”和“反动日记”及题为《师大反革命何其多也》的大字报。1967年3月被检举揭发，在班、系、校召开了批斗会后，按北京市公安局意见接受“群众专政”。因不堪忍受被囚禁宿舍的孤寂生活，在知道“修建科劳改队”后，就主动加入了这个学生劳改队。此公酷爱绘画。平日劳动毕，即回修建科，在从各处搜集的纸上作画。利用周日到北京图书馆借阅图书（学校已经吊销了他的借书证）。做了不少有关美学、绘画史论的笔记。

5.张国钧：数学系三年级学生，湖北武汉人，老家河南，因此一口标准的河南话。是一个快活人。自感钢笔字和毛笔字均上不了台面，于是突然决心练习毛笔字。虽有宏大志向，但实行起来太不专业，只在报纸上练习写字。不巧报纸上有毛主席的照片，被井冈山公社成员发现，于是成为趋近于反革命。如果对于一个平素老实的人，可能就放在群众中监督就行了（其实那样更难些）。但他素喜社会活动，与造反兵团头头铁崇光同班，并过从太密，被疑为其军师，便由趋近于反革命，一下子被视作真正的反革命，送到修建科劳动了。能够在修建科当反革命，他日子反而更快活了。

6.张梅英：政教系三年级学生，山东聊城人，中共预备党员。因为在思想汇报时说毛主席肚子挺出来，像孕妇，被视作破坏领袖形象，被送到修建科劳动。在修建科，负责打扫卫生和生炉子。后成为杨以鸿夫人。1968年分配到陕西陇县工作。

7.许永康：物理系二（3）班学生，新加坡华侨。解放初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学生，肄业参军参加抗美援朝。转业后又以调干生身份于1963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因学习吃力，留级到物二（3）班。他是被一系列的“疑似”送到修建科的，此足以证明谭厚

兰们管理之没谱。他被疑似为五七年的漏划右派，疑似为五九年的漏划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大串联中的照片中的背景有桥梁，又被疑似为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等。其实，谭厚兰们要惩治他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他是造反兵团的活跃分子。这么个“老家伙”还要造反，很令人生气，于是索性让他当反革命去。“文化大革命”中学校无重大建筑任务，修建科的日常工作为小的修修补补。通常出工时，是开工一袋烟，工作一个小时又一袋烟，再工作一个小时就收摊回家。因此，抽烟是获得额外的休息的必要条件。当时，其他学生赖父母供养，只能买些碎烟叶来卷大炮筒以解馋。老许有工资，可以抽二角几的纸烟。每到工地，他差不多给每人发一根纸烟。抽烟过后，大家干活去了，他便在一旁继续抽烟，一直到收工时候。这些人脑子活络，总能找到办法以最快的速度完成工作。老许年龄大，大家嫌他碍手碍脚，也乐得抽他一棵烟，让他在一边呆着。这么安逸的日子，老许却受不了，便以一种传奇性的动作离开修建科。在张国钧和李文博的掩护下，他偷跑离开了学校。他的这一动作惊动了一些正苦于没事干的人，物二（3）班邵先亮们便进入修建科追查，并带走张国钧和李文博。张国钧和李文博回修建科时，已脸青鼻肿。大约在追查的过程中，发现老许在修建科里的日子太好过了，所以当他被抓回来以后，就不准他再回修建科。他不被当反革命后，热衷于焊半导体收音机。看到他可以将收音机焊得那么小巧精致，大家直感叹，还是术业有专攻呀。

8.赵鸿尚：教育系二年级学生，山东聊城人。当过三年解放军。他的主要军事技能是烧饭，因为当的是炊事兵。也是由于对毛主席不敬的言语并同时对抗井冈山公社而被送至修建科。他有一句名言：“抓紧时间偷懒！”这句话在表面的玩世不恭之下蕴藏着丰富的哲理，让人终生受用。他也是一个快活人，除了睡觉和喝醉了，总是笑嘻嘻的。他的到来给修建科的生活增添了新的活力，大家打他会做饭的主意。几经交涉，他终于答应主持做饭。大家将干活时收集的废纸卖了几块钱，买了三斤多肉和一瓶白酒。我在伙食科劳动过，便去“拿”一些大葱和白菜。从工人师傅处借来厨具，便由赵鸿尚张罗做将起来。十来个人为这三斤肉忙得热火朝天，令不远处劳动的干部和教师们好不羡慕。数学系老师郝炳昕评价说：“当人有信念的时候真是毫不畏惧的！”赵鸿尚后来分配回老家，在聊城县教师进修学校任教。

9.顾孝悌：不久就被抓。

另外，当时学校还有一个“干部、教工劳改队”，像数学系的王树仁书记、中文系的启功教授和黄药眠教授、李长之教授，物理系系主任孙煜等都在其中，他们有时也会到修建科“劳改”。他们干的主要是一些轻活。

“劳改队”的这些学生们，每天早上吃完早饭后即到队部报到，“天天读”一个小时之后，就在师傅的带领下从事各种体力劳动（有时冯师傅会与他们一同劳作，有时只负责分派劳动任务，并非时时刻刻“监督”他们，所以，一天里他们最为愉快的就是劳动的时候），夜里则回到各自的学生宿舍报到、睡觉。

除此而外，他们中有的人还曾被“勒令”每天清晨清扫楼道和厕所的卫生。

专政小组要求他们每周至少写一次思想汇报和检查，负责任的专政小组组长会不时对他们训训话。

“劳改”的过程中他们遇到过老者避人耳目的温馨问候和祝福，偶尔也遭遇过不明事理的“红小兵”的追打。

总的说，他们感觉自己已经沦为“贱民”。

虽说带队的冯师傅很是关照，但这些被“劳改”的学生们干的还是常有较为繁重的体力劳动：如三九天在气温零下十多摄氏度的整个夜晚抢修冻爆的水管；最冷的日子衣着单薄站在敞篷卡车上郊外拉木料，以致下车时人已迈不开步子；用大马驾辕的平板车人力拉很重的木料、砖块和水泥板等。平时，修缮队所有的“小工活”和泥瓦工、架子工、水工、钳工、锅炉工之类各种零七碎八的杂活他们都干过。可以说他们的足迹遍及北师大的每一个角落，化学系所在的老校区及附近的生活区、西单那里的教工住宅区都出现过他们的身影。

由于没有经验、缺乏具体指导，他们遭受工伤的事也时有发生，扭伤腰腿是常事，有的手指骨折也不止一次（后来，杨以鸿在房山“石化总厂”的基建工程中接受“再教育”时被巨石压断两根手指；李世取在石景山高井火力发电站接受“再教育”时手指再次负伤）。

下面是发生在“学生劳改队”的二三事：

### 1.杨以鸿、刘中柱等惨遭“大游斗”

1968年的暑期，师大掌权的“井冈山”红卫兵和与之对立的“井冈山造反兵团”的争斗进入白热化阶段之时，为了打击当时被困在“工五楼”内的“造反兵团”，将他们宣传为学校“牛鬼蛇神”的总代表。“井冈山”的决策层祭出一招：先在“牛鬼蛇神”中寻找“兵团”的支持者和同情者，选出来后再集中在“工五楼”前搞一次大游斗。

先是“井冈山”派人到“学生劳改队”开会，让每人都对“井冈山”和“井冈山造反兵团”的斗争表态。当时“劳改队”中的这些学生“牛鬼蛇神”们早已远离了校内的运动，对“井冈山”与“造反兵团”之间的那些是是非非知之甚少，所以他们的表态多是模棱两可，总的还是希望两派团结合作。

接下，有的系还专派人到“劳改队”背靠背找有关学生个别讯问，问某某在平时是否和“造反兵团”有联系或是否有支持、同情“造反兵团”的言论。其实，平素的“劳改”中，大家都很是自觉地不谈时下的政治，即便闲谈，对校内的事更是很少涉及，这种背靠背的揭发想也不会有什么重大发现，但是，他们中仍有人在劫难逃。

后来，确定被抓到“工五楼”前大游斗的学生牛鬼蛇神是物理系的杨以鸿、刘中柱、李文博和数学系的张国钧……

为什么是他们？虽说李文博因一张大字报《公社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而全校知名，但那是1966年底的事情了。可是因“井冈山”的大字报一直在批判“造反兵团”奉行的是无政府主义，说李文博的《公社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宣扬的正是资产阶级反动的无政府主义，说在思想根源上“兵团”与李文博本是一丘之貉。数学系的张国钧原本也是“造反兵团”的同路人，而刘中柱与杨以鸿的好友李观韶也是兵团的。据说那天在“工五楼”前被游斗的牛鬼蛇神很多，场面也很是惨烈。刘中柱和杨以鸿的脖子被用铅丝吊上大筐勒着，筐里装有砖头，分量不轻，遭拳打脚踢地游斗下来，他们的脖颈都被勒出了很深的血印。男儿有泪不轻弹，“出事”后从未流过泪的杨以鸿被释放回来，一入劳改队队部就禁不住泪如雨下；刘中柱本是这些学生“牛鬼蛇神”中身体最为强壮，也是平时最乐观的，六尺高的汉子回来也是泪水滂沱，黯然神伤……

这是修建科劳改队经历的最黑暗的一天。

### 2.奇特的“白专道路”

杨以鸿与刘中柱本来就是班上的学习尖子。虽然在劳改队中异常艰苦，但仍坚持走“白专道路”。杨以鸿原来是学俄语的，但在劳改队中从A、B、C开始学起了英语。当时物理系的“摘帽右派”刘辽老师也在接受劳改，刘老师是专门搞相对论研究的，他们俩就偷偷地向刘辽老师学习相对论。负责监管他们的工人师傅在得知他们学习的情况后不但不阻止，反而暗中保护他们，后来还设法为他们安排了一间房子充当他们的学习场所。在他们的带动下，数学系的李世取也悄悄地复习起功课，并自学俄语版的“概率论”教材等。中文系的敦进田和张传亭拜启功为师，醉心求教书法习字。中文系的杜哲森则潜心学习素描绘画……

十年动乱结束，杨以鸿、刘中柱、李世取顺应时代感召，先后考取各自专业的研究生，得以在自己的研究领域施展能力。杜哲森以中文系学生之资历考取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绘画史”的研究生，后来自成为独具风格的田园昆虫画一派；张传亭和敦进田后来也都有自己的书法成就，当与他们在“劳改队”的这段经历有直接关联。

### 3. 逆境中的“爱情之花”

张梅英是“劳改队”中唯一的女性学生，是个中共预备党员。因为在思想汇报时说“毛主席肚子挺出来，像孕妇”，被视作破坏领袖形象，被送到修建科劳动。在修建科，负责打扫卫生和生炉子。张梅英通过与杨以鸿的几次偶然接触，发现这个已经沦为“阶下囚”的年轻人并没有悲观，没有失去对生活的信念。他仍然坚持学习专业知识，坚信凭着自己的双手总是可以挣饭吃，坚信只要自己在一门事业上能够成功，总会得到社会承认的。于是对他产生了好感，最后演变成爱情。杨以鸿与张梅英都是1968届的，1968年12月份，1968届学生开始毕业分配，张梅英因为问题没“升级”，被如期分到陕西陇县工作，杨以鸿因仍是“反动学生”被延期分配。张梅英在告别时提醒杨以鸿：“我如果去了以后要永远当农民，你也要做好将来一辈子靠工分吃饭的思想准备。”得到了杨以鸿的肯定答复后，双方的恋爱关系就这样确定下来了。张梅英临走之时，杨以鸿去向尚不明，她到了陇县后写给杨以鸿的第一封情书、第二封情书都是先寄到李世取那里，再由李世取转传给杨以鸿的。1970年，这对患难之交的年轻人终于结婚成家。这也是“劳改队”中的一段佳话。

1968年八月至九月间，工宣队和军宣队进驻校内主政，派别争斗而致乱纷纷的局面渐渐平息。随着各项“斗、批、改”工作慢慢步入正轨，也可能得益于运动初期“学生问题一律不整”的“文革十六条”吧，到1969年三月至四月间，“学生劳改队”终于解散了。

## 五、结局

劳改队解散后，中文系的敦进田、张传亭、杜哲森和数学系的李世取都回到各自的班级继续接受教育；63级的杨以鸿、刘中柱、李文博、张国钧因“延期分配”分别到本系低一年级的班上继续接受教育。虽然班内的同学大多数都比较温和，但一有“好事”，例如要抽少数人到北京石景山区的高井热电厂、房山县“北京石化总厂”（当时称东方红炼油厂，简称“东炼”）的建筑工地“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他们便是“首当其冲”的“合适人选”。杨以鸿就是在“东炼”劳动时被压断了两节手指头。因为林彪、“中央文革小组”还在台上，那顶“反革命”的帽子始终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

1971年9月13日，林彪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印证了刘中柱、杨以鸿“当五年反革命”的正确。按理来说，“12月黑风”的当事人个个都是英雄，但是为了说明伟大领袖一贯“洞察一切”“永远正确”，军宣队、工宣队的代表分别找杨以鸿、刘中柱、李文博、

敦进田、张传亭、李世取谈过话，总的是要他们端正态度，要正确认识“九·一三事件”。大意是：林彪后来出事不说明你们早先就对了……关于你们给林彪贴大字报的事情组织上以后不会再提，“你自己也不要说当初你如何如何正确”，等等，大耍流氓腔。1972年4月，所有的64、65级学生被扫地出门，刘中柱、杨以鸿、李文博也跟着一起被分配。当时他们提出：我们是1968届的，早就该分配了，我们现在刚被分配，用人单位一定要问个为什么，所以希望工宣队能把我们当时写的大字报放在我们档案中，用人单位看了我们的档案就一目了然了。对于这样一个很合理的要求，工宣队就是不答应。还说什么，1966年12月林彪是副主席，你们那时反对他还是错的。真不知道这是什么逻辑！一直到“四人帮”被打倒两年后，北师大党委才正式给他们平了反，才肯定他们当时的行为是正确的，是值得肯定的，同时还补发了扣发的工资。

刘中柱后来考上了北师大物理系的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在华中科技大学物理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为引力理论和复杂系统理论。1990年以来，从事光纤使用孤立子进行通讯的理论研究，分析在改变光纤的参数时，光孤立子可能发生的改变以及对于通讯过程的影响。在这一领域，参加三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研究工作，发表了有关的研究论文十篇，获得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同时，研究具易磁化面的自旋链的朗道—栗夫席兹方程，在国际上首次给出了这个方程的孤立子解的解析表达式。这个结果发表在《物理评论快报》上。同时还发表与此有关的论文四篇。后来又从事毫微米距离的引力—Casimir力的研究，发表论文两篇。还从事声致发光现象的理论研究，在《物理化学杂志》等杂志发表论文两篇，并从事有关检验光子静止质量实验的理论问题的研究。在《物理评论》等杂志发表有关谣言在传播过程中如何被放大，以及交通堵塞问题等复杂系统性质的研究论文十篇，均为SCI收录。

杨以鸿1980年考取首届CUSPEA，1984年以优异成绩在犹他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在“色心物理”方面曾一度处于世界上领先地位。但他谢绝了美方的高薪聘用，重回北师大任教。但因他在“文革”中长期遭受打压，经常借酒浇愁伤及肝脏，于1987年身患肝癌，经多方治疗无效，不幸于1988年2月3日午夜逝世，终年41岁，英年早逝。为了纪念杨以鸿，北师大1988年7月1日出版的《师大周报》用整整四个版面，以“专号”的形式发表了长篇纪念文章，详细介绍了杨以鸿不平凡的一生。

李文博后来被分配回原籍佳木斯，任佳木斯师范专科学校（后升级为佳木斯师院，现为佳木斯大学）教师。1980年代调入北京印刷学院，1997年转到北方交通大学（原北京铁道学院）任教。他是研究生导师，我班一位同学的女儿就是他带的研究生。我班有一同学在深夜跟他打电话，他还没有回家，仍在实验室做实验。1989年他参加了民主运动。遗憾的是，李文博已在2006年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李世取1979年9月考取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研究生，1980年12月被选举为北京市海淀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81年11月，分配至郑州原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工作，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曾多次获奖，其中突出的有1997年获总参某部技术工作突出贡献奖并获政府特殊津贴，2002年、2006年两次被评为大学优秀研究生导师等。1983年以来，公开发表学术论文120多篇，专著《密码学中的逻辑函数》于2002年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著作出版基金全额资助，2003年1月由北京中软电子出版社出版；专著《密码学中的有关概率模型》于2004年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和电子信息科技专著出版专项资金资助，2005年11月由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编写的硕士研究生学位课教材《测度论——概率论基础》2006年由信息工程学院出版。



敦进田曾任河北省深泽县师范学校校长，后任辛集市一中高级教师，退休前在深泽教师进修学校工作。

张传亭曾任中学副校长，退休前任中共阜阳市颍东区委宣传部副部长。现为中华诗词学会会员，安徽书法家协会会员，阜阳市诗词学会副会长，阜阳市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阜阳市老年书画研究会常务副会长。2014年，他撰写的回忆启功先生的十篇文章，曾连载于《中国文物报·鉴赏周刊》。

杜哲森于1978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研究生班，获硕士学位并留校工作；任职于学报《美术研究》编辑部，兼史论系专业写作与画论教学，历任副主编、编审、史论系教授。系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致力于美术史论研究、中国画创作及古体诗词写作。主要论著有《元代绘画史》《中国传统绘画史纲：画脉文心两征录》《四画僧的人生与艺术》《道家意识与文人书画》《七言论画》诗稿（未出版）及文人画专论和当代美术评论。绘画作品出版有《孩提梦》画集。

老华侨许永康已于2000年逝世。物二（3）班的同学十分怀念他，在2010年许永康逝世十周年时，特地制作了一个《怀念亡友许永康专辑》（PPT）。他们在专辑中写道：先生一生坎坷，尽管满腔热血爱国，却屡次无端挨整。“文革”中更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住过“牛棚”。1989年参加民主运动，坚决反对动用军队镇压民主运动。1991年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关进秦城监狱，几天后被驱逐出境，从此客居香港，2000年在香港去世，享年70岁。

邪恶压不服真理，金子一定会闪光。阶级斗争害煞人，唯民主自由是正道。

2016·04·12于上海

◇ 作者说明：

1.本文得到了文中主人公刘中柱、李世取、张传亭、敦进田大力支持。许多史实都经过他们核实，特在此向他们致谢！刘中柱2009年写的许多资料，是教育系64级学生郭文涛（电视连续剧《刘少奇过渭水》的编剧）精心保存下来的，谢谢郭文涛！

2.陈闯创先生为我提供了1966年12月19日的北师大《井冈山》小报等历史资料，发挥了重大作用。同样向他致谢！

3.因为离当时快达50年了，有些时间等细节，当事人的回忆都不一致。后商定以1966年12月19日北师大《井冈山》报提供的时间为准。本人发在《记忆》150期上的《对北师大“文革”的几点看法》中与此有冲突的以本文为准。

4.因“文革”后停课了，无级可升。文中表述的年级、班级均为1966年6月份时的班级称呼。

5.因时隔太久，刘中柱、杨以鸿、敦进田、张传亭、李世取当年的大字报目前尚未找到。他们大字报的主要内容都经当事人认可。尤其可惜的是，保存刘中柱、杨以鸿大字报的李观韶已于今年1月15日不幸病逝，寻找此份大字报的重要途径就此中断。现在“文革”的亲历者很多已过世，在世者最小的都已过花甲之年，抢救“文革”资料是我们这些亲历者的责任，大家共同努力还原真实的历史吧！

（作者介绍：赵惠中，1946年生于江苏宝山县（1958年划入上海），1964年考入北师大物理系，1972年被分到江苏省昆山中学（当时改名为“东方红中学”），1982年调回上海宝山，先后在月浦中学、淞浦中学、宝钢三中任教。2006年退休。）

□ 来源：《师劫——北京师范大学文革亲历者文集》。黎云编著，（香港）时代文献出版社，2019年1月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

---